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2014/8

#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关于宋氏家族研究的几点思考

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

《孙中山评传》的出版与孙中山研究的未来

宋庆龄在近代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几次重大抉择

宋庆龄等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恢复孙中山「三

大政策」案之提出

宋庆龄与美国友人浦爱德：浦爱德档案对研究宋

庆龄的意义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关于邀请宋庆龄访美的英国外

交部档案

宋庆龄致牛恩美函（1953—1986）

「孙文发售债券案」档案文献及相关资料选编

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北上史料汇编（下）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  
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Sun Yat-sen & Soong Ching Ling:  
Archives & Research

第五辑

孙中山宋庆龄  
文献与研究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编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5辑 / 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58-0941-1

I . ①孙… II . ①孙… III . ①孙中山 ( 1866~1925 )  
—人物研究—文集 ②宋庆龄 ( 1893~1981 ) —人物研究—  
文集 IV . ①K827=6 ②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4 ) 第195187号

###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 第五辑 )

主 编 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5mm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14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0941-1/K.160  
定 价 40.00元

《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编审委员会

顾 问： 鲁 平 金冲及 许德馨 张 磊 姜义华 林家有  
沈渭滨 熊月之 吴景平 盛永华

编委会主任： 匡成鸣

副 主 任： 李竞业

编 委： 黄亚平 朱玖琳 宋时娟

廖大伟（特邀） 邵 雍（特邀）

王锡荣（特邀） 沈海平（特邀） 邢建榕（特邀）

主 编： 黄亚平

副 主 编： 朱玖琳 宋时娟

本辑执编： 朱玖琳

# 目录

## 学术论坛

001 关于宋氏家族研究的几点思考 / 姜义华

## 专题研究

005 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 / 姜义华

017 关于孙中山《挽刘道一》诗的几个问题 / 周兴樑

033 郭泰祺与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的创建——兼论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意义 / 蒋耘

055 宋庆龄在近代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几次重大抉择 / 盛永华

073 宋庆龄等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案之提出 / 朱玖琳

091 宋庆龄在中国救济福利领域的贡献与作用 / 沈海平

106 宋庆龄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解、阐释与实践 / 邵雍

## 学术述评

118 《孙中山评传》的出版与孙中山研究的未来 / 林家有

## 读档札记

126 宋庆龄与美国友人浦爱德：浦爱德档案对研究宋庆龄的意义 / 王成志

## 回忆口述

140 永远的怀念 / 史美芬

148 二姑宋庆龄和我家 / 牛恩美口述 李纯涛整理

155 我所知道的宋庆龄 / 黄浣碧口述 沈海平整理

## 档案选编

162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关于邀请宋庆龄访英的英国外交部档案 / 郑培燕 译注

- 179 上海市档案馆藏虹口宋氏老宅档案选录 / 邢建榕 董婷婷 整理
- 227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的报告 / 朱玖琳 徐世熙 译注
- 257 宋庆龄致牛恩美函(1962—1980) / 郑培燕 李纯涛 译注
- 289 “孙文发售债票案”档案文献及相关资料选编 / 刘杰 编注

### 海外译文

- 300 一位华人洋基佬的脚注  
——牛尚周1913至1917年的书信 / 牛康民 著 朱玖琳 译
- 316 《最后的女皇——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选译  
/ 宫洁菁 译注

### 史料辑存

- 327 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北上史料汇编(下) / 葛培林 编录
- 378 《申报》载宋母倪珪贞葬仪史料汇编 / 朱玖琳 编录

## **Contents**

### **Academic Forum**

- 001 Jiangyihua, *Reflections on the Studies of the Soong Family*

### **Monograph**

- 005 Jiangyihua, *Sun Yet-sen and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 017 Zhouxingliang, *Issues of the poem MOURNING LIU DAO-YI by Sun Yat-sen*
- 033 Jiangyun, *Quo Tai-ch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in London—And comments on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 Sun Yat-sen's Kidnapped Event in Lond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 055 Shengyonghua, *Significant Choices made by Soong Ching Ling at the Vital Moments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 073 Zhujulin, *O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roposal of Re-establishment of Sun Yat-sen's Three Great Policies to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5th Central Committee of KMT by Soong Ching-ling etc*
- 091 Shenhaiping, *Soong Ching Ling's Contributions and Role in Modern China's Relief and Welfare Causes*
- 106 Shaoyong, *Soong Ching Ling's Understanding,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un Yat-sen's Thoughts of People's Livelihood to Practice*

### **Review of Academic Activities**

- 118 Linjiayou, *Publication of THE COMMENTARY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Studies on Sun Yat-sen*

### **Reading Notes on Archives**

- 126 Wangchengzhi, *Soong Ching Ling and Her American Friend Ida Pruitt: The Significance of Ida Pruitt Papers to the Studies of Soong Ching Ling*

### **Oral History**

- 140 Shimeifen, *My Fond Remembrances*
- 148 Nienmei, *Aunt Soong Ching Ling and My family*
- 155 Huanghuanbi, *All I know about Soong Ching Ling*

### **Selected Archival Materials**

- 162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vitation to Mme. Sun Yat-sen to Visit the United

- Kingdom owned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 179 Selected Records on Old House of the Soong Family in Hongkou owned by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 227 Records on the Police Department of the Shanghai French Concession to Commemorate Sun Yat-Sen's Activities owned by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 257 The Letters from Soong Ching Ling to Niu Enmei ( 1962—1980 )
- 289 Selected Archival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Securities Issued by Sun Yat-Sen in 1917

**Overseas Works in Translation**

- 300 Footnote on a Yankee Chinese: Letters of Shang-chow New, 1913—1917/Peter Kong-ming
- 316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Historical Data Collection**

- 327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Tianjin "Da Kung Pao" on Sun Yat-Sen's way to Peking(Part II)
- 378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Shun Pao Daily News" on the Funeral Ceremony of Soong Family's Mother Ni Guizhen

## 关于宋氏家族研究的几点思考<sup>\*</sup>

姜义华

今年6月上海文史馆的一次会议上，我向参加会议的杨雄市长提出，上海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历史名片，有自己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上海文化的积淀，文化的历史资源，在上海现代化的大都市建设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以为，宋氏家族以及这一家族的众多成员，就是上海非常珍贵的历史名片。宋氏家族在上海，应当算是上海的骄傲，也是上海一笔非常宝贵的历史财富。当然宋氏家族不只属于上海，它也属于中国。

非常高兴的就是这些年来宋氏家族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宋子文档案的整理、公布，我想现在已有了条件，由吴景平博士把他先前的《宋子文评传》做一个大幅度的改写，而且可以编出来更为详尽的《宋子文年谱长编》。

我最感兴趣的是宋庆龄的研究，这几年真的有很大的突破。在以往多少年里，宋庆龄，在我们印象中，还是一个相当平面的人物，一个线性的甚至概念化的人物。随着宋庆龄大量的书信，包括她的英文书信的收集、整理、出版，使得我们开始对于宋庆龄有了一个立体的了解。她的内心，她的真实感受，她一生中间许多重大的关键性事件的真正的情况，关于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情况，我们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但是，我觉得宋庆龄的研究确实是有了非常好的、过去所没有的新的进展。我们期待着更多、更丰富，至今还没有开放的

\* 本文为姜义华教授于2013年11月1日在“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变迁”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该研讨会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同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联合主办。

相关的档案、相关的文献的公开、公布。

相比之下，我觉得宋氏家族中间宋蔼龄和孔祥熙的研究还没有多少突破，我们期待着胡佛研究院更快地把这一部分档案全部开放整理，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现在还相对比较薄弱。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蒋介石的研究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而宋美龄的研究，现在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原来一些概念化的东西上。一个活生生的宋美龄究竟怎么样，我们了解的非常少。昨天我看到台湾“国史馆”要搞一个宋美龄的图片展，我1993年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宋美龄的照片整整一个大房间，所有抽屉里都是她的照片，里边大部分大概都没有拿出来。

宋氏家族的整个研究，我觉得现在还有非常大的空间，有非常多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我想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会议所出的一个这么大的题目：“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变迁”。宋氏家族实在是对近代中国影响太大，从宋耀如开始，三个女儿、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婿，都在中国政治上，特别在民国政治，包含到台湾以后，包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宋庆龄，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影响都非常大。会议用“近代中国的变迁”这样一个大题目来涵盖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非常大地开阔我们的视野，重新构建我们对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的维度。

宋氏家族为什么它能够在近代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宋氏家族的不同成员为什么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想谈一点。

我觉得在考虑近代中国宋氏家族命运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我有一点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实际上由三个大部分构成。一个大部分，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运动。近代以来，它形成一个大的高潮，这构成中国近代社会大变迁中间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第二个大部分，是近代中国开始产生了一场中国历史上、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没有过的运动，这就是现代化的运动，包含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包含知识化、大众化、世界化，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过去没有过的、新的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能够把这两个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是我们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民

族解放运动,或者说民族斗争,面对西方的列强,特别是日本发动的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的战争,中国的民族运动高涨。这是第三大部分。这种民族运动会把农民运动和现代化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三个大运动相互关系来看宋氏家族的命运,以及宋氏家族主要成员不同道路的选择,我觉得可能提供一点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思路。

我觉得,在中国民族运动中间,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和农民运动中间,宋氏家族不同的成员处于怎样不同的地位,这和他们的命运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认真而深入地加以思考。

宋氏家族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宋耀如开始,他们一家在中国是比较最早、比较最系统地接触到西方教育、西方文化影响的。他们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相当的熟悉。尤其从宋耀如先生开始,包括他的所有子女,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徒那样的信仰,他们的责任意识,以及他们的献身精神,应当说在宋氏家族主要成员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他的子女,从上海受教育开始,后来又到美国留学,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应当说比较系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但是,他们都是回到中国,投身建设和改变中国的这一事业。这是他们的一大特点。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又未尝不是他们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就是对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缺乏足够的了解,不清楚怎样真正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怎样将现代化运动和农民运动连接起来。这个可能在宋氏家族大多数成员身上一个弱点所在。

今年是宋庆龄女士诞生 120 周年,也是毛泽东诞生 120 周年,他们都诞生于 1893 年。我在来开会的时候就想,纪念毛泽东诞生 120 周年,应当认真思考毛泽东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失误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他的最大成功,就是他能够把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分散的农民组织成我们这样一个巨大的政党,通过党把农民集结起来,并组织起一支现代的农民军队,指挥一场现代农民战争,这是他成功的地方。他后来的失误,根源在于他对现代化特别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知识化、世界化可能带来的新的异化,可能带来的新的矛盾、新的冲突,有太多的担忧,在这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搞建设的时候,表现得相当明显。相比之下,我觉得宋氏家族在现代化方面,结合

吴景平博士现在做民国的财政史、金融史，从宋子文、从孔祥熙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方面的发展中间有其长处，但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解决不了农民问题，相反，剥夺了农民，大大激化了同广大农民的矛盾冲突。当然，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在大陆的作风，在台湾搞了农地改革，后来国民党能在台湾生下根，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接了农民这个地气。国民党的票源，它的最大的票仓，首先来自农民。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怎样深入研究宋氏家族和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一点启示。

第二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处理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从宋氏家族发展上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关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这就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孙中山晚年倡导“以俄为师”开始，后来包含蒋介石，包含宋子文，当然宋庆龄更是，跟苏联关系千丝万缕，非常复杂。怎么样处理好中国和西方世界、中国与苏联长期的关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变动中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怎么走自己的路，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所有的宋氏家族的成员，包括三位男性的女婿，都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宋氏家族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我觉得对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对今天中国发展怎样既广泛吸收国外各种有益的资源，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自己的路，仍然可以提供很多启示。因为这三个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现代化运动，农民运动，相互关系怎么处理好，外国成功的经验能否适用于中国，这些问题至今仍然继续困扰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新的中国人，仍然要面对这些问题。中国能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能否及时地成功地解决。在这两大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敢于直面，一定要敢于排除各种障碍，认真去解决，我觉得只有这样做了，我们的目标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

姜义华

### [ 内容提要 ]

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位先行者，又是20世纪中国倡导社会主义及“以俄为师”的一位先行者，更是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知识和能力”同时积极“学欧美之所长”这一启蒙新路径的开创者。孙中山之所以先是批评性地学习西方，后来有选择地师法苏俄，再后更明确地坚持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都根源于他始终不渝地努力寻求真正能够使中华得到振兴的正确途径。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全部历史充分证明，启蒙的内涵和历史使命，绝不是机械地模仿或移植他者，而是通过真正的自我反省，深刻而全面地认识自我，在此基础上，由自发的或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的必然王国。自省，自知，自觉，自由，这才是启蒙的最高境界。

### [ 关键词 ]

孙中山 中国启蒙运动

### 一、既依次递进而又互相重叠的三重启蒙

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是既依次递进而又互相重叠的三重启蒙。

中国启蒙运动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挑战。最初，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的声光化电、机器工业，震动了中国；随后，西方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制度，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文化制度，震动了中国；再后，西方个人本位、利益最大化、生存斗争优胜劣汰等核心价值观念，震动了中国。中国以西方这些成就为坐标，对自己重新加以审视和检讨。

中国启蒙运动开始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日益暴露，以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已经勃兴。这样，当中国充满期待学习西方时，饱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之痛的中国志士仁人更容易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种种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并天然认同这些揭露和批判。于是，中国又开始了以西方社会主义为坐标的启蒙。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这一启蒙更集中表现为“以俄为师”。

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型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强固文化与制度传统的巨型文明，中国又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型国家，师法他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抛却自己原有的根柢。师法他者时，曾一度产生过“万事不如人”的悲观情怀，但更多智者早早就发现，师法他者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都无法全面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真实问题。中国的启蒙必须是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是中华文明的自我反省、自我扬弃、自我更新。因此，在整个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中国如何走符合中国实际的自己的路，一直是一个极为强劲的诉求，并最终取代前二者成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主流。

考察一下孙中山与上述三重启蒙运动的关系，便不难了解他在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 二、民治、民有、民享：批判性地学习西方

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位先行者。

孙中山最初对于西方的认知，清楚表现在他1894年1月的《上李鸿章书》中。他在信中介绍自己时说：“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这封上书的主题就是强调：“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对此，他逐一作了疏解：“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人

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农政有官则百姓劝〔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所谓物能尽其用，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无关卡之阻难，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则货物之盘费轻。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孙中山由此作出结论：“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sup>[1]</sup>

这些论述表明，孙中山这一时期所期待的学习西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要像西方那样重视发展教育、发展实业、发展商务这样一些技术性、工具性层面。

从创建兴中会到创建同盟会再到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对西方的认知，有了很大的飞跃。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是他1905年10月发表的《〈民报〉发刊词》，其中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sup>[2]</sup>

孙中山特别认同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盖茨堡演说时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一再申明：“我们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

[1]《上李鸿章书》(1894年6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18页。

[2]《〈民报〉发刊词》(1895年10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

共享!”<sup>[1]</sup>新生的中华民国，就是要“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主所有、为民主所治、为民主所享者。”<sup>[2]</sup>在《〈民权初步〉序》中，他写道：

何为民主？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主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主也。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主。”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主所有、为民主所治、为民主所享者也。<sup>[3]</sup>

民族、民权、民生，一步步递进，民有、民治、民享，一环环相扣，孙中山认为，这方才是欧美各国活力本源之所在。他依据这一标准评判欧美各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之得失，确定中国革命之目标，规划中国发展之路径。它表明，较之《上李鸿章书》，孙中山所倡导的学习西方，这时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可以说，这时已从先前的技术层面、工具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

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反思欧洲近代以来发展时谈到，欧洲从“提倡自由放任主义”，推动了“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然而，“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现在贫富阶级的大鸿沟，一方面固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恶现象自然会演变出来呀。”他认为，除此之外，“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 Stirner）、卞夏加（Sören Kierkegaard）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

[1]《三民主义》（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4页。

[2]《〈建设〉杂志发刊词》（1919年8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0页。

[3]《建国方略》（1917至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2—413页。

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源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源也实由于此。”<sup>[1]</sup>自由放任主义也好，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也好，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也好，这些欧西文明的核心价值，梁启超在十多年以前都曾大力鼓吹过，现在，他对这些核心价值逐一提出了质疑。

而孙中山早在1917至1919年撰写的《建国方略》中，对西方文明的这些核心价值已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后来又在1924年所发表的《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又作了更为中肯的检讨。对此，笔者在《论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论〈孙文学说〉人文精神的新构建》、《孙中山晚年对生存斗争社会哲学的批判——孙中山褒扬儒家政治哲学的思想基础试析》等文章中（俱见《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一书）曾做过专门论析。

孙中山1912年在许多演讲中已指出：“物竞争存之意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sup>[2]</sup>“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sup>[3]</sup>在《孙文学说》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sup>[4]</sup>

既然社会国家为互助之体，道德仁义为互助之用，那么，人就不可能作为孤立的个人而存在，人与人的关系更不可能只是利益追求与利益交换关系。基于此，孙中山批评了自由放任主义，批评了个人本位，批评了

[1]《五四风云人物文萃 梁启超 张东荪》，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7页。

[2]《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年5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0页。

[3]《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8页。

[4]《建国方略》（1917至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196页。